

### 组织编写首部教育学讲义

20世纪50年代,是父亲的黄金岁月。他继续从事教育事业。他喜欢教书,15岁开始,从小学教到大学,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。1946年,他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,在上海《正言报》教育版“家庭教育新论”专栏连载三个月之久,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,名为《父母与子女》。因为这本畅销书,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——也是我大母亲的老师,于1948年破格聘请陈汝惠为大夏大学教育系副教授。父亲把当年被大夏大学破格录取和被母校破格聘为副教授,终身引以自豪。1971年,台北商务印书馆在未与作者沟通的情况下,又再版了《父母与子女》这本书。

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日和反蒋革命活动中,父亲还结识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、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。1950年,他把父亲推荐给即将赴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,父亲就跟随王校长跋山涉水七天,来到厦门大学,担任教育系副教授、校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全国高等学校大多开设了教育学课程,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编著的《教育学》为教材。凯洛夫的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问题,对于高等教育缺乏深入的有特色的研究。厦门大学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,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,很需要属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学课程。1955年,父亲担任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后,改用他们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讲义开课。后来他向王校长建议,组织编写了一部适用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材,并付印数百本,分送国家和各省图书馆,以及各有关大专院校交流使用。

在完成编纂《讲义》的同时,父亲还在《厦门大学学报》上接连发表《〈实践论〉与教育原则》《〈实践论〉与教育过程》《向〈红楼梦〉研究中的颓废主义作斗争》《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》等文章。

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受到严重的摧残和

# 我的父亲陈汝惠(下)

◆ 陈佐洱 口述 汤涛 俞玮琦 整理



▲ 1983年冬,陈佐洱与父母合影

◀ 1959年初,陈汝惠全家摄于鼓浪屿

折磨。但他坚持等待,申诉十八年,直到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终于获得了当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的亲笔证明材料,他的历史“疑点”得以澄清,摘掉了“内控”帽子,彻底纠正了错案。全家人放下了压在身上18年的沉重“包袱”,喜极而泣。1978年10月,父亲在一张照片背面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往事已矣,只恨白发生。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,千金难买青春少。”

### 不要成为“空头文学家”

受到父亲的影响,我自幼喜欢文学。五六岁的时候,父亲当时在《正言报》上夜班,一般清晨才回家休息。我正好睡醒起床,就从小床跳到大床,钻到他被窝里要他给我讲故事。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,像中国的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,还有外国的《金银岛》《伊索寓言》,都是在他被窝里听到的。上初中了,一天父亲带我走进厦门大学图书馆,问我:“要看哪一种书啊?”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地方收藏了那么多的书,欣喜若狂。从此,从厦大图书馆借读到了很多至今都难忘的好书。不幸的是,初三时我得了严重“神经衰弱”,不

得不休学半年。

父亲说过:“热爱是成功的一半。如果孩子热爱这个事业,只要这个事业是正当的,就支持鼓励他。”我的最大的兴趣始终在文学上,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《园地》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后,一发而不可收。父亲虽然手把手教我习作,但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当作家,反而很担心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“空头文学家”,还多次强调这是鲁迅先生对儿子的告诫。高考时,父亲鼓励我报考外文系甚至图书馆系。他说,有文字功底将来可以搞外国文学翻译,业余也可以写点科普小品,还特意买来少儿科普作家高士奇的诗集给我读,引导我走高士奇的路。

1960年我考大学,成绩在福建省文科生中名列前茅。默写我考前在学校公布的范文的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,而我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进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。大学四年,我保持各科成绩全优,曾当选系学生会主席,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。

“文革”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被调至福建团省委创办《福建青年》杂志。1983年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任社长,1987年兼任总社

港台新闻部主任。同年9月,两个台湾记者绕道日本,首次公开来大陆采访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派中新社作为接待单位。

那天,很多中外记者都在首都机场等候台湾记者。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负责迎接和接待。飞机晚点三个小时,半夜才降落首都机场,我在廊桥上开口就对两位台湾同行说:“欢迎欢迎,等了你们三十八年了!”第二天,海内外很多媒体都将这句话作为头条标题,有的说是“中共统战语言”,有的说是“真情的流露”。当时中新社借住在新华社大院里办公,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,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说:“就是这人,说等台湾人三十八年了,什么阶级立场?”我感到有压力,忐忑了好几天,后来听说小平同志说这句话讲得好,才放下心来。

之后,好几个中央单位要调我去工作,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。我想起小时候,父亲给我讲《金银岛》的故事,《金银岛》英文名是Treasure Island,treasure就是宝岛的意思。他那时候就告诉我,中国也有宝岛,比如台湾岛、海南岛,还有一个香港。

当我代表国家参与和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时候,父亲已经退休,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,甚至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,但是他知道儿子在钓鱼台国宾馆与英方谈判。有一次,谈判连续进行了十几个小时,回到家已经深更半夜了。一开灯,看到父亲佝偻着腰在门边等我。他看到我回来才感到放心,用上海话反复说要当心英国人。

我们三兄弟在事业上都有小成就。如果问我父亲,你是怎样教育子女的?我想他一定会说:是国家培养的,是党和人民培养的。的确,父亲把我们三兄弟交给了国家和人民,以致年老体衰时身边无一子一女朝夕照顾。他在家里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党爱国家,哪怕再委屈,仍要求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。在父亲言传身教下,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,二弟佐沂是浙江大学的工学博士,三弟佐滢是著名指挥家、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。现在我们三兄弟也都已老迈年高,对于曾经与父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,不仅如此,还抱有深深的缅怀和感恩。

摘自《上海滩》

## 敦刻尔克



[英]约书亚·莱文/著  
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/译

### 7.丘吉尔临危受命

1940年5月7日,英国国会就挪威战役展开辩论,当时的领导人是内维尔·张伯伦。

张伯伦一上来就软弱无力地为政府在挪威的表现辩解,为他4月初时所说的希特勒已经“错失良机”的判断找理由。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演讲来自英国海军元帅罗杰·凯斯爵士,他说自己的发言是代表“正在战斗但闷闷不乐的海军官兵们”,他们不快乐,是因为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要为挪威战役的失败负全责。但他并没有批评海军大臣温斯顿·丘吉尔,相反,还表达了对他的“喜爱和敬佩”,并且表示期待看到“他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”。这一切,议会里的众人都听得很认真。

伯明翰斯帕克布洛区的保守党议员里奥·埃默里在下议院发言。埃默里向来反对张伯伦支持丘吉尔,他在演讲的结尾,把奥利弗·克伦威尔的名言送给张伯伦:“你在其位时间够久,却做得之善可耻。走吧,我们已经受够了。以上帝之名,赶紧走吧!”

第二天中午,国会辩论继续,首先发表演说的是南哈克尼的议员赫伯特·莫里森,他同时也是最德高望重的工党议员之一。在演讲中,莫里森请求分组表决,结果是大部分人对政府抱有信心。这场辩论真正的高潮是丘吉尔的演说。他坚决地为政府(和他自己)辩护,但他心里明白,只有政府(和他自己)输掉这场辩论,他才有可能当上首相。5月8日晚的投票中,政府获得281票,在野党获得200票,张伯伦认为这是足够确保他继续当首相,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,工党认为各位议员不会支持他的领导。他别无选择,只能辞职。

但是谁来接手呢?有两位候选人:丘吉尔和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,但哈利法克斯认为自己是贵族身份,接手这份工作不合规矩,所以拒绝了首相职务。当时盛行的看法是,丘吉尔在政治上是个极端分子,是个祸害,而希特勒则是一个天才,他像个巫师,早就算到了英国当权阶级会意见不合的弱点。

张伯伦辞职后,丘吉尔面前的道路就一片光明了。还是同一天,丘吉尔到达白金汉宫后与国王一起开了些无伤大雅的玩笑,国王告知丘吉尔,希望由他来组建一个政府。

驾车驶离白金汉宫时,丘吉尔和他的保镖沃尔特·汤普森之间的对话就没这么幽默了。汤普森说,“我只希望您能在另一个时间坐上这个位子,现在您的任务太艰巨了。”

丘吉尔的眼中逐渐蓄满泪水。他说,“只有上帝知道这一切事关重大,我只希望现在还不至于太迟。不过我担心我们已经太迟了。我们只有倾尽全力……”65岁的丘吉尔终于获得了期盼已久的职位。他任务艰巨,但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这份工作都不可能给他。

这份责任最终要落到英国士兵身上。5月14日阳光灿烂,英军在这样的晚春时节里与敌军进行了第一次接触。

第二天早上,丘吉尔被法国首相雷诺的电话吵醒,这次后者显得惊慌失措。他告诉丘吉尔,打输了,通向巴黎的道路洞开,可能不得不放弃法国。丘吉尔试图让他冷静下来。但就在同一天,荷兰投降了。

5月16日,法国陆军第1军团的指挥官加特森·比约特上将命令法国、英国和比利时官兵撤退,以防被突破的色当的德军装甲师包抄。让许多前线英军士兵感到惊讶的就是这个命令,而丘吉尔得知此事后则感到非常郁闷,他不明白为什么100辆德国坦克突破了色当的防线,正与德军交战的英军就必须撤退,这肯定会让英国远征军冒更大的风险。

丘吉尔决定跟参谋长海斯廷·伊斯梅少将及英国总参谋部的副部长上将约翰·迪尔爵士一起去趟巴黎。他在巴黎会见了盟军总指挥莫里斯·甘默林上将、法国国防部长爱德华·达拉第以及法国首相雷诺本人。

刚一见面,甘默林就开始解释形势。在他面前的架子上放着一张地图,上面标注出了盟军的前线。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黑色箭头,它代表的是德军的前进路线。甘默林说完后,丘吉尔用法语问:“战略预备队在哪里?”甘默林回答:“没有。”

丘吉尔傻眼了。法军竟没有战略预备队?到此地步,法国请求英国再派6个空军中队到英国都同意了。会谈后丘吉尔飞回英国,他现在也认为英军需要撤退以保证防线连续性。

### 5.再当谢晋副手

好事成双,拍完《啊!摇篮》,黄蜀芹紧接着又跟谢晋导演拍了第二部电影——《天云山传奇》,职位也提升了,担任第一副导演。

《天云山传奇》是谢晋导演的第一部“反思电影”,通过刻画所谓的右派分子罗群和围绕着他的几个不同性格的女性,将人物的个性、情感变化与政治风云、社会矛盾、历史发展融合起来,大胆揭示出一个事实:一批正直而善良的人们被错误地划为右派,但他们初心不改,爱国爱家爱事业,是值得尊重的大写的人。

黄蜀芹感觉到谢晋导演对女性的刻画非常独特,往往是外表柔弱,内心虽然也会有柔弱之时,但本质上总是刚强而自立。联想到自己,这种对女性特点的捕捉与表现,让黄蜀芹有了一些难言的体验。

《天云山传奇》摄制组上下一心,特别认真。作为第一副导演,黄蜀芹承担的责任更多了。在一个电影剧组里,除了导演,一般还会有两个副导演。导演负责主要演员。谢晋对演员的挑选是很精心的,《天云山传奇》中的石维坚、王馥荔、施建岚、仲星火等主要演员,都由他亲自选定。两个副导演,一个管群众演员,一个管服装、道具。拍摄战争场面的前夜,副导演要到重点部门去巡查,枪支、烟火材料是否准备充分?服装、道具是否符合要求?拍摄现场千变万化,拍摄过程有长有短,万一准备不充分,就会影响整个拍摄的进程,造成浪费。经过《啊!摇篮》的操练,黄蜀芹自然已经今非昔比了。

在拍摄过程中,对“徒弟”倾心相授,从不藏私,他希望年轻人能尽快成长,早日挑大梁。筹备时谢晋就让黄蜀芹参加,从讨论剧本、挑选演员、撰写工作本到制定拍摄计划。黄蜀芹用心地看和听,整个筹备过程结束,她便熟悉了谢导的工作思路和方式。

其中,写工作本让黄蜀芹得益匪浅。工作本是介于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之间的导演手记。选好外景地、演员到位后,导演会有些新的想法,或情况有变需要调整,这时就需要把这些改变记录下来。大概是谢晋知道黄蜀芹不擅长语言表达,就让黄蜀芹和他一

起写工作本,故意让她多动手。黄蜀芹对此心存感激,心想,写工作本是导演一部电影必须的重要环节,以后肯定要用,主创人员人手一册,才会明白导演准备怎么拍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,大家就能依据工作本做相应准备。谢晋是个思维极其活跃的导演,在拍《天云山传奇》时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,绝不会按部就班地按照分镜头剧本亦步亦趋。黄蜀芹觉得,这是一名导演的最好状态。她发现,每天谢晋在摄影机旁站立片刻后,立即会提出新的方案,便诉黄蜀芹如何调整。黄蜀芹便以最快的速度把谢晋即兴闪现的思想火花形成文字,整理出新的工作本后,第一时间交到谢导手上。

一切准备就绪,黄蜀芹就站到摄影机旁,代替谢晋喊“开麦拉”。第一次喊时,黄蜀芹的声音怯生生的,不太响。谢晋说,“太轻啦,用足全力喊!”一遍又一遍,黄蜀芹习惯成自然,她不再拘谨,彻底放开了。

黄蜀芹又一次领教了谢晋导演对细节的要求严格。有一堂吴遥卧室的内景搭在摄影棚里,那时是夏天,要拍一场他刚洗过澡的戏。谢晋要求浴室玻璃上要有水汽,但工作人员觉得很难办到。谢晋火了,发誓一定要弄出来,没有水汽不拍!因为仲星火演的吴遥要边用手抹掉玻璃上的水汽,边和宋薇讲话。后来从背景底下通过管子把热气通到上面,而摄影棚里开着冷气,冷热相遇就产生了水汽。还有一个细节是吴遥当上地委副书记后的服装,谢晋要求服装师准备一件七八成新的丝绵小棉袄,穿在里面,外面再罩上笔挺的卡其中山装,说明这个人物表面艰苦朴素,骨子里却是讲究的。一般人认为,这件小棉袄穿在里面看不见,不穿也没关系嘛,但谢晋就是要做到功夫在镜头外,要让演员穿上衣服后产生符合角色身份的感觉。据仲星火说,穿上丝绵棉袄后感觉果然不一样,才演得出相应的感觉。

跟了谢晋两部戏,黄蜀芹真的学到不少,包括如何做一个摄制组的领军人物,如何细致地对待每一个成员。黄蜀芹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入门了。终于,严师谢晋笑着对黄蜀芹说:“好了,你过了,自己独立去当导演吧!”

## 黄蜀芹



沈一珠 夏瑜

写意光影织妙镜